

時事問題叢刊之四

物價問題

時事問題叢刊之四

物價問題

物價問題（時事問題叢刊之四）

著作者：千家駒 發行人：陳劭先

實價國幣六角（外埠酌加郵運費）

桂林 張家園 西南印刷廠印刷

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發行

本書保有著作權及翻譯權

文 269 (59) 甲 家
011 (1—2000)

目 錄

當前嚴重的經濟問題（代序）（千家駒）	一
一 物價問題的癥結（章乃器）	一二
二 物價與後方經濟（陳岱孫）	三二
三 論物價問題（千家駒）	四一
四 論當前的物價問題（石西民）	六二
五 平抑物價問題與確立經濟抗戰政策（顧翊羣）	六七
六 物價差別政策（谷春帆）	八二
七 從物價問題說到國際收支（惲逸羣）	八八
八 外匯政策與改善民生（魏友樂）	九六
九 外匯・貿易・吏治（楊翊勳）	一〇四

當前嚴重的經濟問題（代序）

在今天，大概無論什麼人都感覺到物價問題的嚴重吧！除了發國難財的大亨們外，無論是工農大眾，公務員以及自由職業者沒有不受到日益高漲的物價的壓迫，特別是最近各地糧價的飛漲，大家的心裏都有一層陰影，存着一種疑問：「我們能不能克服物價高漲的危機，假如讓它這樣發展下去，會不會成爲抗戰前途的一種障礙？」這的確是目前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加以檢討的。

一般對物價問題浮面觀察的人，有的把物價高漲單純歸因於法幣發行額之逾量，有的則認爲完全由於商人之屯積，也有的則視爲商品之供給與需求失其平衡。這些自然都有部份的真理，然而並不是事實之全面的真相。或者可以說這都僅僅看到了事物之一面，而沒有把物價問題當爲聯

時經濟危機之一個表現形態，即沒有把它和整個抗戰經濟及戰時經濟政策聯系起來看，這我們認為是不够的。

自然，最表面的看法是認為法幣發行之逾量，引起物價之高漲，即所謂通貨膨脹的問題。但我們如對問題作進一步的考察，就知道這並非公允的論斷。以法幣發行額來看，誠然戰後三年比戰前的發行額是要增加得多，就以政府所公佈的數字來說，截至今年六月底止，四行法幣發行額共三十九萬四千萬元，這個數目是否與實際相符，我們自然還得保留，再加上各地方銀行發行兌換券及輔幣券與一元券，合計起來也許比公佈數字要大一些，亦未可知。但即令我們以七八十萬萬元來估計，戰後發行鈔票比戰前也不過增加四五倍。何況所增發的法幣，並非全部分在大後方流通，而有一部分是在淪陷區內，僅上海一地已達一萬萬元以上。即以大後方面論，由於內地經濟的開發，人口的移殖，各地幣碼的需要自必比戰前增加，法幣發行額縱然比實際需要要超過，但也決到不了超過實際需要量三倍或四倍以上，而目前各地的物價却已經比戰前不止漲了五倍或六倍，甚至有高漲了十多倍以上的。（例如布疋，燃料，以及許多外來用品），物價騰漲顯然並非由於通貨膨脹所引起，這是顯而易見的。

再以商品的需要與供給來說，誠然，戰後由於通商口岸的淪陷，交通運輸的困難，商品的供給減少，需要增加，供需失其均衡，物價自必騰漲，這是人所周知的供求律。但我們如對物價進一步去看，則知工業生產品的供不應求，並非自最近開始，自武漢廣州淪陷，南昌失守，粵漢浙贛兩路切斷以後，工業品的供給困難早已存在，何以到今天忽然會嚴重起來。以農產品來說，戰後三年每年都是豐收，今年雖自入秋以來亢旱不雨，也祇能影響一部分的農作物，大體上今年的收穫是豐稔的，何以新谷登場以後，米價反會驟然騰貴起來，供求律之不足以解釋目前之物價問題，也是極為明顯的。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說，通貨增發與物價高漲沒有因果的關係。通貨發行之是否逾量，我們不能由它的絕對量來觀察而必須由相對量來看。假使戰後所發行的法幣大部分用在生產過程中，用在大後方的經濟建設上，那麼，這數十萬萬元的法幣非但不能算多，而且著實還太少；但如果這部分法幣是用之於流通過程中，用之於商人資本的屯積投機中，以及用之於貪官污吏及發國難財者的消費資財中，那麼，問題的性質顯然又取另一種形式而出現了。

正因為我國過去所採取的金融財政政策，並不能把增發的通貨吸收於生產過程上，却把它變

成了社會的游資，在投機市場及商品屯積市場無風作浪，推波助瀾。一般的所謂屯積居奇的問題，也就是這種游資在裏面作祟。這種游資過去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大部分逃亡在國外。據崔敬伯先生的估計，戰後逃避外國的資金達二萬萬美金之譜，如按目前外匯黑市折合法幣，就等於四行公佈的法幣發行之總額。上海游資的充斥，戰後也達到了空前發展的程度，據銀行界估計，集中在上海一地的游資就有三十萬萬元左右，這三十萬萬元游資，當然有一部分便是代表上述逃避的外匯。這大量游資幾乎全部分在投機市場活動，他們在第一個時期是做外匯投機的生意，特別是外匯黑市的變動，外匯買賣一進一出之間，獲利之巨，至可驚人。又因外匯近期與遠期價格的差異（近貴遠賤），套利之厚，亦為任何投資所不及。此外如糧金，地產，商品，外商股票亦成為游資投機之重要對象，孤島之非常的繁榮，銀行獲利之豐厚，就在游資這種刺激之下所造成的。以外商股票來說，衆業公所（外商組織的股票市場）的營業，創了空前的紀錄，而在裏面活躍的即大部分是國人的資金。由於這麼大量游資在上海外匯市場的活動，再配合以敵人有計劃的破壞我法幣的陰謀，結果使我法幣的匯市益趨下墮，成為破壞我匯價之一主要力量。如果說，敵人是這次搗亂我匯市的策動者，則上海的資產階級却正是在客觀上執行敵寇金融政策的罪犯！

但這種架空的投機，有識者早知其終有毀滅的一天，恰好今年五月二日，因基金會暫停供給外匯，英匯突自四便士左右跌至三便士，二五，美匯自六元縮至四元半，乃不旋踵而同風頓起，整個投機市場的崩潰，亦於焉開始。匯市一度暴縮之後即反動回漲，自四元半而五元，而五元半以至六元，於是經營外匯者受意外之打擊！再加以此時國際局勢的急遽變化，德軍進攻荷比的戰事發生，英法失利，人心極為虛弱，美國的物品市場及證券市場發生了劇烈之回風，這一方面使上海之投資美國證券者遭受損失，一方面又使上海的股票市場，亦跟着下跌，這又轉而助長匯市的加速回長。投機外匯標金以及外商股票者，這時乃都深陷於泥沼之中，據銀行界估計，截至六月底止，國人因外股跌價所遭受的損失，竟達四萬萬五千萬元，這是多麼可驚的一個數目。繼之是安南局勢的變動，滇緬路的封鎖，影響到上海對內地的交通，棉紗五金等價格更趨狂瀉，股票市價的下跌，亦因時局急變而無所底止。於是炙手可熱的上海投機市場就在轉天之內，黯然無光，投機家既失利於外股，又失利於棉紗，乃移轉目光到生活必需品上來了。

我們如以大後方物價來看，匯價與游資的破壞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大後方的物價，以時期來說，可以分爲二十八年六月以前與六月以後兩個時期，自「八一三」到二十八年六月以前，物

價雖然已經步趨上漲，但上漲的程度尙屬有限，上漲的速率也較有限。到了去年，特別是自六月以後，則物價飛漲，大有不可終日之勢。這裏面的原因僅有一小部分是自廣州南昌相繼淪陷以後，物資的來源更感困難，更主要的則是自去年六月以後，我國放棄維持法幣八便士水準之政策，因匯價低落，最初是舶來品騰貴，繼之是國產品之原料仰給於國外者漲價，再後是土產代用品也漲價，最後則一般物價水準爲之提高了。由於法幣對外價值的低落，從而影響到它的對內價值，對內價值跌落的結果，又使它的對外價值更爲低落了。其中的發展過程是這樣的：最初是舶來品因外匯高漲而騰貴，於是一般投機商人，就以外匯高漲視爲法幣本身價值的低落，將土產品不論其成本是否增加，也一律抬高其價格，或屯積貨物，爭相貯存，屯積之風開始後，土貨價格愈行上漲，土貨價格上漲，而舶來品之價格更漲，彼此因果，遂造成去年六月後物價高漲的現象。

到了今年六、七月以後，法幣外匯價格的波動早已停止，以法幣匯價說，今年五月二日一度猛跌之後，不久即告回漲，外匯對物價的支配力量應該已經停止。但物價却非但不因匯價之回定而趨跌落，且漲勢愈趨洶湧，尤以最近的農產品漲價爲尤甚。例如以重慶來說，米糧價格曾一度高至二百元一石，桂林米價在秋收以前不過每担法幣二十元（老秤），而新谷登場之後，反猛漲

至最高時達三十五元。其他一般生活必需品亦莫不如此，重慶平價購銷處所公佈的價格，九月初，中等米比二十六年平均漲六倍，布漲十五倍，炭漲十七倍，這種農產品及生活必需品之漲價就決不是匯價緊縮所能解釋，而主要的原因不能不歸之於商人資本之屯積行爲了。但屯積也不是自今日始的，爲什麼到今天忽然會變得嚴重起來呢？有人認爲以前破壞匯價的二萬萬美金的游資，這時轉而破壞物價，這是頗有理由的。雖然我們現在不能退作海外資金逃回國內，後方都市資金回歸農村之肯定的結論，因爲一部分海外資金之逃回國內誠然是事實，然而所逃回的大部分還是集中在上海與淪陷區，流回後方來的到底祇有一小部分，回到農村的數量更微不足道。但由於外匯，標金，外商股票的投機已經英雄無用武之地，這部分資金大多歸集到商品屯積的部門中來，由於商品之大量屯積居奇，而使目前的物價飛躍的高漲，這却是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大量的游資政府何以不能吸收而加以利用呢？這是有它客觀的原因。目前游資最多的大家知道是上海，上海一地的銀行存款便達三十萬萬元以上，但這三十萬萬元以上的存款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活期存款，資金所有主膠着於上海，銀行所使用之資金乃接受於存款人，並非其本身所有，銀行界如將資金轉往內地，即成爲一種冒險行動，尤以活期存款，隨時可發生擠提的危險，而

因匯兌上的限制，調款困難，費用極重，亦爲資金內移之一大障礙。其次是內地缺乏一個容納資金的市場——股票市場，對於一種無組織的舊式經濟機構，銀行實苦無用武之地。上海商人何以願意投資外國股票，因爲上海有外國股票的經紀人，上海資本家一舉手之勞便可以買入紐約股票或倫敦股票，而投資大後方之產業却沒有這種方便。其三，上海是一個投機市場的中心，資金在此運用，轉瞬可以獲驚人之巨利，如果投機風潮不能稍戢，則無論內地投資有多麼雄厚的利息，亦不能引起銀行家的興趣。最後，我們內地現在所需要的其實也並不是紙面上之資金，而是機器原料等等生產工具，如果單單是缺乏資金，則它猶不難由發行銀行所創造，惟其不是籌碼而是生產工具，所以這也非銀行界所能爲力的。

不過，假使政府能够有計劃地吸收游資，至少第一可以減少游資在投機市場——外匯市場及商品市場的作用，使這部分游資不至於成爲破壞外匯，破壞物價的力量，再由於資金在工農業部門的膨脹，刺激後方生產的增加，目前也不會感到這樣嚴重的通貨問題。但正如章乃器先生所正確地指出：「目下儲大游資的產生，是由於戰後財政手段不能消滅軍需膨脹，致令戰時暴利轉變爲游資」。（見九月十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這是的確的，我們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真正符合「有

『錢出錢』要求的戰時財政政策，四十二三萬萬元戰時公債，幾乎完全不會拿出來公開地發行，而大部分積存在銀行的保險庫裏。（戰後發行公債，祇有救國公債一種是公開勸募的，但因流弊滋多而終止）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直到今年一月一日才開始徵收，而且稅率甚低，逃稅之方法甚多，亦不能真正征及暴利利得者。我們看看英國在一九四〇年新預算中，伍德氏將所得稅標準率提高至八先令六便士，（戰前原爲五先令六便士）如加入附加所得稅，則最高率達每英鎊征十八先令。超過利得稅則自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起之利潤，如超過戰時標準利潤時，不問任何工商企業，對其超過利潤，均課以百分之六十稅率。如與我們的戰時財政政策比較起來，我們豈但是瞠乎其後，而且也不免有劫貧贈富之嫌了。

馬寅初先生曾經對於抗戰三年來的戰費負擔全部落在中下階級身上，而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少數的財神菩薩，表示其正義的憤慨，並且提議征收財產稅，使第四年起，戰費應由發國難財者負擔而予中下階級以一喘息的機會，這是特別值得我們贊成的。的確過去的財政政策早已不能適應今天的抗戰要求了，假如我們依然不能執行『有錢出錢』的財政政策，橫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危機是不容易獲得解決的，今天的問題是：如何解決政府戰費籌措的困難，如何平抑今日一天比一天

高漲的物價，如何避免惡性的通貨膨脹，如何安定一般人民的生活，如何消除政府銀行籌碼不足而社會游資充斥的矛盾現象，這許多問題都是互相聯系作用的，它的解決不能是枝枝節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我們必須把握住問題的中心作根本的澈底的解決。問題的癥結就在政府能不能以財政手段來吸收在投機市場及商品市場無風作浪的游資？換句話說，就在政府能不能予發國難財者（不論其爲奸商或污吏）以應得的制裁，籍曰可能，則不但物價可以平定，屯積居奇的行爲可以取締，而且戰時財政亦可因此而得解決，我們亦可避免走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如不可能，那麼目前的困難確實是不大容易克服的。

說到這裏，我們知道不僅是一個財政經濟的政策問題，而實在還包涵有政治問題。祇有政治上力求進步，民主政治切切實實拿來實施，民衆組織與民衆力量能够加以發揚，於是一切的徵收暴利稅，取締貪污與浪費，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等才能有實行的保障條件，才不至於變成永不兌現的支票。革命的經濟政策必須建築在革命的民生主義上面，「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這句話是十分正確的。

蔣委員長在「七七」三週年告全國軍民書中說：「尤其當此勝利成功接近的時候，更必戒慎

恐懼，接受一切有利於抗戰建國的建議與一切有利於抗戰建國的批判」。這是偉大的領袖的風度，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由於最近經濟困難的加增，物價高漲所引起人民情緒的不安，許多亡國論者和民族失敗主義者這時又會大大抬頭起來，傳播一些悲觀失望的空氣，頹喪我國民衆的抗戰情緒，以求貫徹其屈膝媾和的最後目的。但我們却不應該如此，我們今天不能也不應諱疾忌醫，誇大困難，我們的任務是應該把困難恰如其分地指出來，而對這種困難，而尋求所以解決之道。由於我們這種困難，並非客觀上基本地存在着的，他並沒有帶有不可克服的性質，而主要地是由於我們主觀努力的不够，政治進步之趕不上抗戰形勢的發展，舊有的傳統的經濟政策之不足以適應今日抗戰之客觀的要求，一句話說，這是由於人謀之不臧而產生的，所以祇要我們能澈底改變過去的作風，實行戰時革命的財政經濟政策，那麼，危機一定可以克服，而中國之最後勝利亦是一定可以得到的。（千家駒）

物價問題的癥結

一、問題的本質和觀點

我們不必諱言當前的物價問題是相當的嚴重；倘使讓它就此發展下去，那不但要成爲經濟上的危機，而且要成爲整個抗戰的重大危機。然而，同時我們必須明白：這種危機是可以克服的，是不必過分惶懼的。爲什麼呢？因爲在這個嚴重的現象當中，並不存在着基本的病徵。說得明白一些：依着物價本身自然的發展，這種現象是不應該有的；物價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爲民族敵人的破壞，是因爲動搖分子的推波助瀾和消極怠工，更因爲許多愚蠢無識者的盲從妄動。這種種一切的危害，是每一個決心抗戰的人都準備着的，是抗戰過程中必然要遇到的。我們只有毫不驚

奇，毫不猶豫的給它一個迎頭的痛擊。

關於物價問題的研討，本來就有兩派不同的意見。有的人從貨幣着眼，認為物價的漲落，由於通貨的膨脹與緊縮，代表這一派的，就是貨幣數量說。另外，有的人專從商品着眼，認為物價的漲落，由於商品本身數量的盈絀：代表這一派的，就是經濟學上周知的供求律。事實上，由於貨幣已經變成商品交換的媒介，這兩派的理論是不可能孤立起來，更不可能對立起來的。比方，商品需要量的增加，自然會引起通貨數量的增加。而通貨數量的增加，也往往要造成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同時，通貨數量的減少，自然會引起商品供給量的增加，（這是單就交換範圍而言；倘使通貨緊縮的影響及於生產部門，那就會得相反的結果）。而商品供給量的增加，也會造成通貨的不足。這兩者的關係既複雜錯綜若此，我們是不能堅持一說各走極端的。自然，我們也不能持二元論者的態度，用「互為因果」「無分主輔」一類的說法，含糊其辭，終久找不出癥結之所在，轉成為關係部門推諉責任的藉口。我們也須確確實實的認定，商品的供求能够絕對的影響物價，而貨幣數量只能夠相對的影響物價。這個理由也很簡單：倘使商品的供給大量的超過需要，通貨無論怎樣膨脹，都沒法使物價高漲；反之，倘使商品需要大量的超過供給，不管通貨怎樣緊縮